

1104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

第十九期

嘉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日

目 录

我的治学之路	黄 昆(1)
接待中央部级领导及知名人士的回忆	周学章(10)
解放前后的秀州中学	许树德(19)
编后	(23)

我的治学之路

黄 昆*

这次中科院教育局为研究生组织的专题讲座,不知为什么点到我。也许是认为我在大学呆了 20 多年,讲课比较擅长。可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讲课或作学术报告是一回事;要跟研究生讲做人、修养、成才之道,又是另一回事,因为讲这一问题得讲出点道理来,就需要比较多的素材。另外,我是做具体研究工作的,缺乏政治理论修养,所以对讲这次课很为难。怎么办?想来想去,只能讲一讲我个人的治学经历,所走过的路,然后结合经历的每一阶段,谈点个人的体会和看法,供大家参考。

从上大学到出国留学

这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也即培育我对科学的追求的阶段。

我在北京上的是燕京大学,它是由美国基督教会办的。那时,这所大学的课程门类较少,课程内容也较浅,从学专业基础知识讲,是比较局限的。不过,却有利于我打另外一个基础,即培育了我对科学事业的追求,这可以说是基础的基础。

我在上一、二年级时,讲微积分课的老师,是位从剑桥大学毕业不久的英国教员,他不仅讲课非常出色,课外对学生也十分关心。出于启发学生对发展科学的追求的目的,他出面找了几个优秀生,组织了一个课外研究小组。在课余和他本人一起学一些科学发展的新知识。这个“尖子班”,试图学习“相对论”,学习新兴的“量子力学”及其所带动的一些新的数学方法,主要是矩阵数学。这一活动进行了一年,结果包括这位教员本人在内,对相对论谁也没学

EB12/51

懂。不过,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学习新知识,探讨科学的最新发展,对培育我对科学的爱好与追求,却很有影响。

另一方面,因大学课程不重,我从事课外阅读的机会较多。当时,我读过的两本书,给我的印象最深,书名至今都还记得。一本叫 *Men of Mathematics* (《数学家》),讲的是从牛顿以来的数百年间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们的生平和贡献;另一本叫 *Microbe Hunters* (《探索微生物的人们》),主要讲从发现细菌以后的一二百年中,科学家们一个接一个地找到了引发一系列重大病症的细菌和防治办法。该书对这些医学方面的大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作过程,描写得非常生动感人。读了这两本书,觉得这些科学家们的事业,是再辉煌不过的了,比什么都振奋人心。这些科学家们对科学事业的追求和献身精神,对我震撼很大,影响着的人生,使我对科学事业产生了兴趣和爱好。

再有一个事例,就是学习量子力学的问题。我们那个研究组,想要学的是包含量子力学的数学。在当时的情况下,量子力学在国内还是一门非常新颖和神秘的学问,它代表了当时物理学发展的顶峰,所以我对它非常景仰。因此,我在大学三、四年级时,通过对图书馆里仅有的几本介绍量子力学的书的自学,初步打下了量子力学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大学的毕业论文:《海森堡和薛定谔量子力学理论的等价性》。因为在当时,量子力学的发展,先是海森堡提出了一个量子力学的理论,其数学形式是用矩阵来表示的;一年之后,薛定谔也发表了他提出的量子力学理论,是以波动方程形式表达的。我的论文,就是论述这两种理论为何是等价的。将两者沟通后,就变成了一门具有普遍性的量子力学理论。这一工

作本身,并没有自己的创见。不过,通过这一实践,增强了我对这一理论的发展过程的参与感,自己觉得也进入了这一科学新领域。

我在1941年大学毕业后,去了西南联大,先是当助教,后来做研究生,一直到1945年出国留学。

在这期间,对我最有影响的事,是认识了杨振宁和张守廉。他们两位都是天赋极高、聪明过人的人。课堂上一些我认为是非常艰深的理论,他俩很快就能轻松地掌握。所以在日常交谈中,这些知识成了我们随时讨论的课题。对科学的追求,在他俩身上随时随地都有体现。因与他俩交往甚密,我也受到了感染。

总之,从上大学到当研究生,通过课外小组的活动,通过自学,通过同学间的交往,培育了我对科学的爱好向往和追求。这对有志于科学研究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国家近年来的政策,在基础研究方面,强调要提高质量,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要做到这一点,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首先需要有对科学不懈追求的精神。这种追求,不是口头上而是要渗透到自己的思想中去,甚至于渗进到每天的生活中去。做基础研究的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思想境界,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不大像一个做基础研究的人。

出国留学阶段

1945年,我考取了去英国公费留学。有这种机会的好处是,你可以自主地填报志愿。

我在西南联大时,有一位英国教授给联大捐赠了一大批在英国出版的科学书籍。我对这批书很感兴趣,大都翻阅了一下。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叫莫特的英国科学家,写了三本书:《原子的碰撞理论》、《金属与合金的电子理论》、《离子晶体中的电子过程》。这使

我感到这位科学家的学识非常渊博；另外，在这三本书中，后两本讲的是固体物理的问题，虽然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固体物理”一说，读了之后，感到内容新颖、奇特，很有意思，他所研究的领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我就到布列斯特大学做了莫特的研究生。

现在想来，我在科学研究的方向选择上是非常幸运的。首要一点，选择莫特做导师，也就选择了将固体物理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固体物理作为一门学科来讲，在 40 年代刚刚形成，以后有了很大发展，称得上是物理学在 20 世纪里最重大的一个新的学科的发展。我在那个时期进入这一大有作为的科学领域是很幸运的。其次就是导师莫特的治学风格，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跟他认识和接触以后，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从对科学的追求到真正进入科研领域，是通过对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的解决逐步发展的。原认为他很博学，跟他接触后发现，他只关心他当时所研究的具体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你跟他讨论，他几句话就把你打发开，或用打叉的办法马上给敷衍过去了。我觉得这一习惯对于我影响较深。其好处是，科研工作需要你集中全部精力来解决你所面临的问题。当然也有坏的作用，时间一长，知识面就较窄。集中精力与否，是你能否做好研究工作的关键。

我讲这些，是说明我的出国留学，是有目的、有方向性的，因而才得以有良师的指点 and 影响，也才有我后来的作为和成就。从做学问的目的讲，我极不赞成盲目追求出国，不管去什么地方，不管去干什么，更不知道跟什么样的人干工作，这就丧失了出国留学的积极意义。认为只要出国就好，甚至到条件并不怎么样的地方去充当

廉价劳动力，那会白白浪费自己最为宝贵的年华，是贻误青春。

在做博士后的日子里

我赴英国留学的公费期限是三年。1947 年完成博士论文《稀固溶体的 X 光漫散射》之后，还剩下一年多的时间，我想换个地方去进修，老在一个地方对增长才干有局限性。在这段时间里，我已了解到玻恩教授对量子力学的发展有过大的贡献，是欧洲公认的物理学大师；另外，他自 1910 年起就致力于晶格动力学的研究工作，也是公认的晶格动力的创始人，其学术造诣颇深。征得他的同意，便去了爱丁堡大学，在玻恩手下做访问学者。去后不久，玻恩就给我看了他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酝酿写就的《晶格动力学》一书粗稿，这是一本完全以量子力学为基础的晶格动力学理论。那时，他已年近七十，感到精力不够，难以完成该书的系统写作工作，建议由我执笔，合作完成此书的写作。我觉得这是个发挥聪明才智的极好机会，乐于从命。有趣的是，我当时还有过一个错误的看法，认为写文章别人不一定看，因为文章一年要发表很多，写得再好别人也不一定能读到。而写成专著的书，容易受到注意。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最早的那篇《固体材料中的杂质缺陷导致 X 光漫散射》（即“黄散射”）的论文，过了几十年还有人看，并做实验予以验证。总之，觉得写书不错。可是，那时我已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请，在三年留学期满后回国任教。为此，我便将写书的事告知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饶毓泰征求意见，他热情地支持我承担这一工作，我才答应了玻恩的建议。到这时，我的公费仅有几个月了，用来写书的时间远远不够。不曾料到，我原所在的布列斯特大学的一位讲师，应聘于利物浦大学当教授，约我去他创办的理论物

理系做博士后研究员。我给他讲好,在这三年中,我用一半的时间来写书,这便是三年博士后生涯的由来。

在这三年里,我的时间是紧张的,工作是繁忙的,成效也较为显著。第一,我基本上完成了写书的任务。第二,提出了一对关于光学振动的唯象方程(即“黄方程”)。第三,把这一唯象方程跟麦克斯威尔方程结合起来,又发现了所谓的光子和声子的“耦合振荡模”,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运动形式。第四,提出了所谓的光跃迁多声子理论(即“黄——里斯理论”)。第五,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我又进一步发展了无辐射跃迁的多声子理论。

上述这些工作,是我在科研里程中的几件最有影响的工作。这说明在你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做很多工作的,要充分认识到 30 岁左右的这个年龄段的可贵。况且,这个时期的工作,还可为你以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具体地讲,我在近几年所做的两件最为满意的工作,都是跟几十年前所做的工作有直接联系的,这就是进一步发展了多声子理论。我在几十年前提出的多声子理论,是有毛病的,当时没觉察到,使得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引起了很大的矛盾,好像这一理论与实际对不上号。近几年的工作(即“绝热近似与静态耦合理论”),就是弄清了这一问题的所在,并给予了纠正。再一项工作,是关于超晶格光学声子模和静电势理论问题(即“黄——朱模型”),它实际上是利用了我在 50 年代为了解决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而提出的两个不同的晶格模型,把这两个模型用到超晶格理论上来,解决了超晶格光学振动的一个较为关键的难题。近期国家科委关于我国科技论文的统计表明,在近 5 年我国发表的论文中,我们这篇文章,被同行引用的次数列全国第二位。我讲这些事

例，是希望大家要真正认识到青年时期的可贵，认识到这个时期你在科研工作上是会大有作为的，是会对你以后的工作奠定重要的基础的。

为国效力

我于1951年回国后，立即赴北京大学任教。这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把培养人才的工作放在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学校对教学工作提得很重，我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工作。从33岁到59岁，都是致力于教学工作。

近些年来，新闻媒介的人士多次问我：“你没把研究工作长期搞下去，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是一直没同意这一看法的。因为回国后会全力以赴搞教学工作，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个人服从国家大局的问题。这也并非我事业上的牺牲，因为搞教学工作并没影响我发挥聪明才智，而是从另一方面长了才干，实现自身价值。

在教学工作中，我先后讲了三门课。第一门课是讲普通物理，这是大学生的入门课程，也是经院系调整后列为重点的一门课程。因此，我在教这门课时，全力以赴。虽然一周只讲3次，6个学时，可我用于备课的时间近60学时。集全部精力钻研教学内容，悉心探索最好的教学方法。据说，我的课讲得不错，最近有人说在北大理科的基础课教学中，以普通物理这门课受到的影响最大，这说明我的全力以赴搞教学是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的。对我个人来讲，其收获是真正学全了讲课，增长了才干。

我讲的另外两门课，是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在当时，无论国内国外，都仅有专著，而无现成的教科书可供借鉴，完全是从无

到有搞出来的。固体物理,我先于 1953 年在北大给三个研究生讲起,接着进城给当时的中科院应用物理所的科研人员讲,后来又跟一位苏联金属物理专家合作讲。通过这几次讲课,经过多年的反复实践,才逐渐形成一门系统的固体物理课程。至于半导体物理,它在某些理科学术教学中的重要性,许多专家都有共识。我便约请应用物理所关注半导体科学的王守武、洪朝生、汤定元三位专家合作讲,每人分工讲 9 学时。有些基础后,自 1956 年起,就独自给学生讲。后来,又与谢希德合作,给五个大学联合在北大办的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讲。有此基础后,我们对教材进行了整理,于 1958 年成书出版,成为一本培养半导体学科专门人才的广为使用的标准教材。

这些教材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借助了我在科研工作中的经验,将其作为获取科研成果来对待,潜心研究,臻于完善。所以说做教学工作仍然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和才干,为国家的教学事业作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1977 年秋,我被调到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任职。自教学岗位转至科研岗位,这无疑又是一次客观形势的变化。到了研究所不做研究工作说不过去,这对年近六十的我来讲,又是个新的要求。在这十多年里,尽管有些勉强,我终归还是把研究工作搞起来了,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至少是对本所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人生旅程中,难免因客观形势的变化,对自身的要求也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只要我们能正确对待,转变观念,认真地努力地工作,以积极的态度去适应这一变化,同样可以增长才干,做出业绩,实现自身的价值。

对于成才问题,从我的切身经历,体会出两个小道理:一是要学习知识,二是要创造知识。对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来讲,归根结底在于创造知识。

在学习知识上,我的实际体会是,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而是要服从于应用,要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相匹配。

对于创造知识,就是要在科研工作中有所作为,真正做出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此,要做到三个“善于”,即要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尤其是要提出在科学上有意义的问题;要善于提出模型或方法去解决问题,因为只提出问题而不去解决问题,所提问题就失去实际意义;还要善于作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结论。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至于怎么做到“善于”,我也说不清。反正事实上你要做好研究工作,我体会是非如此不可。

(何春藩依据录像报告整理,原载《科坛文明天地》1996年第3期、第4期)

* 黄昆:嘉兴人。固体理论和半导体物理学家。1919年出生。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部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接待中央部级领导及知名人士的回忆

周学章

我于1952年5月开始筹建嘉兴市立医院,7月就由市委书记杨铭主持第一次院务会议。从那时开始,即开展门诊及收治住院病人。由于我工作十分积极,深得广大市民的称赞,因此于当年11月在嘉兴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副市长,分管文化卫生教育。市长为沈如淙,另一位副市长是原任公安局长的段青友。之后,除主要在医院诊治及抢救病人外,也参加政府一些工作及社会活动。当时不少来禾视察参观的知名人士及民主党派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部长、副部长级的领导干部,都由地委或市委决定派我去负责接待。本来我有笔记本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接待情况,可惜在“十年浩劫”中被毁,现仅凭记忆,追记一些于后。

巴 金

我从1930年读初中二年级开始,就知道巴金这个名字了。因同学中在阅读巴金写的《家》、《春》、《秋》三部名著(俗称“三部曲”),以后在报纸杂志上看到报导巴金的新闻也不少。他大约是在1954年左右,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而复陪同来嘉兴的。当时,市人民政府已由城隍庙侧殿迁入新改建的城隍庙内,“夫人殿”也改为二层楼的办公室。当时的市长是武晓山,他因工作忙来来参加接待。我向他们简要汇报了嘉兴在解放前后的情况。巴金自己解释说他的祖籍是在嘉兴,世居角里街。到他的高祖李文熙(介庵)时才游宦入蜀,遂定居于四川的。其曾祖父、祖父都在四川做官,他的父亲也任过四川广元县的知县。以后,巴金来到上海。所

以在二十年代初他曾来嘉兴二次。记得他说他的祖居是在塘汇，不在市中心。周而复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分管教育卫生系统的工作，与华山医院神经科张源昌教授及华东医院薛邦祺院长是好朋友，彼此十分熟悉。他从张教授和薛院长那里知道我于四十年代曾在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当过内科医师，而且也知道我们三人在医院工作时住在同一房间，所以我同周而复之间谈起来也觉得很接近、很亲切。巴金见此情景笑着对周而复说：“你已变为半个医生了”。记得巴金与周而复同志来嘉兴时，我们未曾组织迎送，也未安排宴请，只是清茶一杯，茶叶还是我自备的。接待虽是如此简朴，但却感到非常亲切。

郑振铎

郑振铎的名字，我在解放前的报刊上看到过，知道他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解放后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他本人是研究考古、文学史的，其学术成就著称于海内外。约在1954年，他来考察嘉兴名刹楞严寺。该寺中有释迦牟尼佛铜像一尊，为国内所独有。铜像溶铜二万斤，神态庄严自然。它代表了我国古代冶炼技术已达到的高度水平。我在儿时经常听到老辈人说，嘉兴穷是穷，但也至少有十万八千斤铜。就是指我们楞严寺有这尊大铜佛，是国内珍稀之宝。当时我陪郑副部长看了铜佛，他十分惊喜。估计这尊铜佛在佛教界古籍中有详细记载，所以他要来亲自一睹为快。然后我又陪他去看图书馆所珍藏的精严寺佛经。精严寺在日寇侵华前后因年久失修，庙宇损坏比较严重，所以将精严寺佛经存放在鸣阳门内图书馆保存。郑副部长系这方面的专家，我则纯系一窍不通的门外汉。这天下午陪他去参观了南湖后，他才返沪。

陈叔通

陈叔通是知名的工商界进步领袖人物，解放前在报纸上一直有报导。他是在1953年宣布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来嘉兴视察的。当时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由中共嘉兴地委副书记李焕陪同他到湖州视察后来禾的。上午在军分区（现勤俭路邮局对面），由李焕向他汇报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的情况，中午大家就在军分区便餐。因为陈老已年迈，又是初交，饭后大家请他休息。但他却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来到我休息的地方，了解嘉兴地区在统购统销后农民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食品问题。这可能是因为地委领导同志向他介绍，我是担任副市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又是高级知识分子，可能会反映当地确切情况之故。记得我向他介绍说，嘉兴是鱼米之乡，农村及广大人民群众食品方面绝无问题，广大市民食品也很充裕。他听后方才放心。由此可见他对人民生活问题的关心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下午，大家陪他去南湖烟雨楼凭吊革命纪念地后离禾。

章乃器

章乃器，解放前是民主进步人士，“七君子”之一，早为知识界所熟知。五十年代他为粮食部长。约在1955年左右来嘉兴视察。我得到市委通知后即在办公室等候。寒暄后，他宣称来禾视察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冬春米”的资料。我们嘉兴、嘉善、平湖、海宁、桐乡、海盐几个县城及乡下的老百姓一向都吃“冬春米”，仅在春季和过年吃年夜饭时才吃白米饭。但上海一带均吃白米。“冬春米”是用已轧去米糠的糙白米每300—500市斤左右，用大竹蔑席围成大囤，加水使其发热后发酵。这种米可贮藏三年左右不变质。用这种米烧饭

出饭率高，且香醇可口，容易消化。尤其是有胃病消化功能较差者，更加喜爱。记得在孙传芳、夏超等军阀混战时期（1924 年左右），我们与舅父家同到上海避难，不习惯吃上海的白米，便设法从嘉善将“冬春米”带到上海食用。身为粮食部长的章乃器，考虑到粮食统购统销后，国家一方面要节约粮食消费，另一方面要防止贮存的粮食霉变，认为“冬春米”是解决这二个问题的办法。当时解放已经五、六年了，“冬春米”已被淘汰，所以他从北京来到嘉兴收集资料。以往湖州一带流行的“蒸谷米”与嘉兴的“冬春米”有些类似之处。1972 年，我参加医疗队去西非马里共和国时，应马里共和国要求，由我国派专家协助建立蒸谷米厂，湖州曾派了粮食加工部门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前往。

我想，今后我们的粮食部门仍应研究这一传统的粮食加工技术，营养学家也应研究这种米的营养价值，作出科学的结论。

章乃器来禾时，当夜就住在我的小办公室内，临时搭了一张小床铺。我于次晨去办公时才知道此事，深有感慨。身居部长高位的党外人士来到基层也如此注意勤俭节约，令人肃然起敬。

章伯钧

当时任民盟中央主席的章伯钧系国务院交通部长，由省交通厅厅长吴化文及省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负责同志陪同，于 1956 年底或 1957 年春来禾视察京杭运河。接待工作由嘉兴地委负责，夜间设酒席两桌款待。地委领导要我也参加宴请。章伯钧主要说了，水运费用低廉，可以降低物资供销成本。京杭运河因已数十年来经大规模疏浚，不少地段淤塞受阻，他设想疏浚拓宽，以便大吨位的运输船通行，提高运输能力，减少铁路运输压力。他还说道，因为我们

的海运能力差,且有危险,疏浚运河就更显必要。

记得章伯钧的官僚气味较重,他与曾在旧社会干过事的吴化文说话较多,而与我们则不太融洽。

崔义田

1952年8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崔义田副部长到嘉兴县东栅乡视察血防工作,由我陪同。见面后,他问我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我回答说是1941年在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与计苏华、张炜逊是同班同学。计苏华1935年参加上海地下党,后担任中华医学会秘书长、北京医院副院长。张炜逊系白求恩医学院院长、山东省卫生厅厅长,后任卫生部外事处处长。崔义田副部长本人也是沈阳南满医科大学毕业的医师。所以,我们之间谈得很是投机。中饭由县政府准备,吃的是白米粥、馒头、花生米,别无其他鱼肉菜肴。崔副部长是中共党员,与后来招待章伯钧时真是天差地远,绝然不同。可见共产党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高贵品质,使人心服口服。通过接待崔义田副部长,对我的思想转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大大增强了我对共产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徐运北

据说,毛泽东主席在1960年春曾召见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徐运北,询问有关血防工作情况,最后指示徐运北到嘉兴蹲点一个月。毛主席认为,嘉兴若能消灭血吸虫病,那末全国其他十二个省(市)均能有办法消灭血吸虫病。为此,徐运北与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白备伍(齐鲁大学医科毕业的医师)来嘉兴蹲点并视察。徐副部长住在县交际处(即内部招待所)。县委要我陪同。他一开始也问了我那个学校毕业,什么年份,目前医务几级等问

题。我一一作了回答。当时全国正在开展“大跃进”，卫生系统也不例外。第一医院（嘉兴血吸虫病防治院）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技术革新的“大跃进”运动，成立了展览室展示技术革新、科学研究的成果。徐运北对所有我领衔发表在血吸虫病科研资料汇编（1956、1957、1958年年刊，由卫生部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编辑，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上的论文均细细查阅。对我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内科杂志》上的论文，也很信服。尤其是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当时代表国家水平，主要向国外发行的唯一医学杂志）上的几篇论文已被英国热带病学公报（T、D、B）转载，更使他兴奋。因为这不仅是国际上对我个人论文的重视，而且也反映了我国医学界在血防工作上的成就。他连口称赞这些论文的质量都是过硬的，丝毫没有虚假。

当时我们医院人少事多，但是在领导的带头下，全体职工日以继夜地忘我劳动，比学赶帮，力争上游。按国家规定，病人与工作人员的比例是 1:1.0——1:1.5，而我院为 1:0.318（即 100 张病床仅有工作人员 31.8 人），为全国之最，被评为全国标兵医院。所以，全国著名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和各省、市、县的医院，从最北面的满洲里到最南边的友谊关都来参观学习。在此之前，徐运北代表卫生部在上海召开华东地区医学院、科研单位及专家会议，大大宣扬了我院的人少事多，以最少的工作人员完成医疗、防治、科研任务的事迹。特别是大大赞扬了嘉兴血吸虫病防治院的科研成绩，以最少的投资，最少的人员，作出一般科研单位难以作出的成绩。《健康报》记者经过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写出了整整两个版面的报导。

在此同时，徐副部长令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白

备伍同志在嘉善县天凝公社东方红大队总结了以灭螺为主的防治经验,对大便检验“一条龙”操作法作出正式的评价。他认为血防工作量过大,速度过快,工作粗糙,必然会漏查不少阳性。对边劳动边进行锑剂治疗也要进行科学分析,从而使我们更加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和科学态度,对盲目追求“快”、“省”、“新”等片面作法敢于道出肺腑之言。

钱信忠

我第一次见到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是在1959年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听说他在参加革命前是上海宝隆医院(德国人办的私人医院,为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实习医院)工作,所以在医务上是内行。当时我们正在开展呋喃而胺临床研究验证。他事前当然已听到上海、中央血防办的详细汇报,所以他已初步了解了研究工作的进展,当然也了解了我的学历和经历。他对临床研究反复强调要“三严”(严密、严格、严肃),强调科学性。因为以前受到“大跃进”、“浮夸风”的教训,所以他认为对我国首次创造的抗血吸虫病新药呋喃而胺(F3006),一定要在科研工作中坚持高标准的科学性,强调要超过国外对寄生虫病研究的水平。钱信忠部长对血防科研工作也十分重视,曾多次与我交谈,特别是他认为我们嘉兴血吸虫病防治院有嘉兴市第一医院这样的综合医院为基础,有作为血吸虫病重疫区的广大农村的覆盖而,有一批临床研究的人员,而且与上海有密切的联系,是很好的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基地。他要我筹备建立有100个床位的研究单位,准备对外开放。我初步估计要有100万元的投资才能新建成一个研究所,而且希望将高家洋房及第一医院东边的天主教堂内解放军97医院所占的几幢房屋(空